



扫二维码
看科学周末



总第 6250 期
今日 12 版

2015年3月13日 星期五
乙未年正月廿三

官方微博
新浪: http://weibo.com/kexuebao
腾讯: http://t.qq.com/kexueshibao-2008

国内统一刊号: CN11-0084
邮发代号: 1-82

“下放博士点”议案引热议

■本报记者 王珊 陈彬

案由

江苏近年经济发展步伐位于国内前列。科技创新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支撑作用非常明显。然而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依然面临体制机制的束缚。

今年两会期间,人大代表、江苏大学校长袁寿其,重点关注了高校学科建设的问题。目前,我国地方高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90%以上,平均每所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5.94个,仅为部属高校的三分之一。袁寿其发现,与部属高校相比,地方高校在博士学科点设置上“很吃亏”。

博士学位授权学科数量不足,已成为制约地方高校开展高层次人才培养、实现内涵提升的重要瓶颈。袁寿其说,作为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,“地方高校在博士培养方面,与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职责、所发挥的作用远远不相适应”。

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,则是地方高校由于“指标”原因难以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。以江苏大学的化学学科为例,其学科水平发展很快,但由于指标的关系,一直未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。袁寿其希望学科授予权力能够下放。



博士学位授予仪式

图片来源:百度图片

争议:

数量平衡是难点

事实上,这一问题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。去年年初,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《关于印发〈关于开展博士、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〉的通知》,对博士学位授权点自主调整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,不过,意见明确规定,“增列授权点数量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量”。

这一规定所包含的意思是,自主权被下放给了高校,高校可以着手于自身授权点的内部优化,进行动态调整。

然而问题也相应而来。随着我国教育科技综合实力不断提升,学科点的发展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,高校会因为“增列数不得超过撤销数”的限制而深受影响。地方高校依然需要

更多的政策支持博士人才的培养。

基于此,袁寿其提出,对进入ESI(基本科学指标集)前1%的主要贡献学科且目前已具有一级硕的非一级博学科,给予单列一级学科博士点指标。

目前,ESI指标已经被学术界广泛用于评价学科的国际影响。目前,国内教育主管部门也已经开始将ESI作为评价高校学科发展的重要指标。

袁寿其告诉记者,在目前国内555个进入ESI前1%的学科中,有些尽管已经完全满足了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水平,却一直没能获批博士学科授权点,学科乃至高校的发展受到非常大大限制。

然而,一些接受本报采访的两会代表委员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。一位不愿具名的大学校长认为,“增列授权点数量不得超过撤销授权点数量”,不仅意味着要进行动态调整,更要对

量进行控制。同时,以ESI指标作为评价学科的标准,虽然被国际学术界广泛使用,但其相当于SCI的变种,而以SCI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在当前已广受诟病,因此也有不妥之处。

延续:

呼声仍是两会热点

近两年,“给予高校更多自主权”“将权力下放到高校”等声音不绝于耳。袁寿其是其中的一个代表。今年两会上,记者还听到了更多的声音。

3月10日,人大代表、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其凤建议,目前的博士后管理过于僵硬,管理成本大,应予以取消,放权给相关科研机构、高校及企业,让其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博士人才并开展研究。

政协委员、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也表示,教育部应该进一步向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下放权力,调动和发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;政府也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,遵循教育规律,尊重落实和进一步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。

“20多年前国家就出台专门的《高教法》,并对高校的教育自主权设立了7条规定,但如今这些权力基本都没有实现。”政协委员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顾也力说,学校从招生到毕业,依然是由行政指标来引导。“大家眼睛都向上,如何低下头来做学问?”

建议:

加强督促规范

顾也力建议,在高等教育领域,教育部应起到指导作用而不是直接管理作用,并督促省市级教育主管部门放权。

“例如高校要办成应用型还是学术型这样的问题,教育主管也要通过行政手段作一定的限制,这显然不合理。”顾也力认为,教育部应该把权力下放给高校,高校则应该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,通过大学章程确定学校的教育定位、价值观和管理模式来管理学校。只有这样,高校才能真正做到集中精力、自我发展。

在人大代表、西北大学副校长高岭看来,这两年教育部已向地方和高校下放了不少权力,但为什么学校和公众感受到得没有那么明显?其中固然有社会预期过高的问题,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策传达需要时间、过程。

“毕竟给你权力时,监督管理的义务也就给了你。因此,地方要制定政策落实的办法,对其中的具体细节进行重新考虑,这是政策有时候会滞后一些的原因之一。”高岭说。

高岭同时强调,当把权力转移到地方后,地方对高校的管理和介入的程度有时会更细致具体,似乎更严格规范,这些都可能造成高校和社会感受不到国家层面权力下放的客观原因。

高岭认为,要改变这一现状,除了公众应给予高校改革更多耐心之外,教育部也应该在简政放权的同时,加强对基层部门的指导,督促政策的具体落实。

两会心声

全国两会期间,各路代表委员齐聚首都论政参政、建言献策,各种观点、意见纷至沓来,让人应接不暇。两会会程已进行了十天,那么,那么,代表、委员们最想表达的观点、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了吗?响应如何?该说的说过了之后,还要怎么办?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。

周成虎委员:为“人”呼吁

本次政协会议上,中科院院士周成虎带来了三份提案。其中,科技改革不出意外成为他最想提的内容。

“要坚持以人为本。”周成虎说,科研活动特别是基础研究,是一项高度的创造性活动,一定要激发人创造性、积极性。提案提交不久,他就在分组讨论中找到了不少知音。他发现,许多委员关心的问题、提的建议,落脚点都在“人”上。

3月10日,周成虎所在小组的组长、中科院院士高鸿钧委员代表科技界在全体会议上发言,主题为“注重发挥基础研究创新引领作用”。在周成虎看来,“发挥基础研究的引领作用,关键还在于发挥人的作用”。

“在这一轮科技体制改革中,相关部门一定会注意到‘以人为本’的呼声,我们期待今年看到相关政策的出台。”周成虎表示,如果达不到预期(相关政策的出台),他将继续通过提案等渠道不断反映,积极履职。

作为一名科技界政协委员,周成虎每年都会参加几次调研,也会在日常工作中深入科研一线了解情况。今年,周成虎的另外两个提案分别是关于扶贫工作有关儿童扶贫的问题,以及农村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。

董明珠代表:为专利保护加力

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,是人大代表、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一直关注的问题。这些年,格力在业界大展拳脚,没少受专利纠纷的困扰。

以外观设计为例,“我们想生产自己个性化的产品,但是一旦产品出来,就很快被模仿”。董明珠说,如果去打官司,会耗费很多的时间,很多人也纠缠在这个过程中。

在董明珠看来,知识产权保护现在面临着法律困境,即权利遇到侵害时,不能够及时得到赔偿,也很难得到足够的赔偿。这无疑是对创新精神的巨大打击。

为此,董明珠建议重视知识产权法官队伍建设,成立专门、相对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庭,培养专业的法官队伍,提高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水平。去年,她将这建议带到了人代会上。而这一建议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从去年11月以来,最高法院相继在北京、上海、广东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,并且将设立技术调查官制度。

不过,在董明珠看来,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虽然不断增强,但是距离市场和企业发展需求还存在较大距离,应该进一步完善和改进。

施大畏委员:用文艺营造氛围

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不可能再简单地、指令式地传达给大众,需要通过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去传达。”3月12日下午,政协委员、上海市文联主席施大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。

这些天来,采访施大畏的记者不少,而“弘扬中国文化”是施大畏每次必谈的话题。“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,除了经济、科技等发展以外,还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。”施大畏告诉记者,在这样的不断呼吁下,文化问题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

施大畏认为,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,首先要理解中国的文化好在哪儿。我们有很多优秀文化作品,比如水墨动画片《三个和尚》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等,这些作品都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,传播了价值理念。”施大畏说。

在他看来,“核心价值观”就是人性中的“真善美”,作为文艺工作者,应该以核心价值观为引领,去提升公众的文化欣赏水平,推进公共文化体系建设。

“我是一个画家。未来,在做好艺术创作的同时,我也会用自身的行动对公众负责,承担起传播和引领的责任,通过艺术作品,把我们知道的体现核心价值观的故事,用最简单、最朴素、最为大众欢迎的方式传播。”施大畏说。

该说的说了,然后是……

■本报记者 甘晓 王珊 倪思洁

记者眼中的两会热词



蛮拼的——科技改革拼了吗?

■本报记者 王珊

穿梭在两委会会场,时时能听到一种声音:科技体制必须要大刀阔斧地改一改了。

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已跨过30年的距离,深层次矛盾在不断凸显。

去年以来,科技计划、科技项目经费管理、科研基础设施、院士制度等一系列涉及科技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相继出台,为深改元年注入丰富内涵。

在3月11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,全国政协副主席、科技部部长万钢总结2014年的工作时说,“无论是科技发展还是科技改革,都是‘蛮拼的’”。

回顾2014年的主要工作,措施确实出了不少。《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管理改革方案》无疑是去年“科改”的信号灯。《方案》自印发至今已经过去数月,接下来,《方案》将怎样落到实处,却令不少代表委员期待又困惑。

政协委员、湖北省科技厅厅长郭跃进就很困惑。《方案》出台至今,实施细则仍未落地,地方处于“待命”状态,翘首以盼。

丢人——去行政化,舍得?

■本报记者 甘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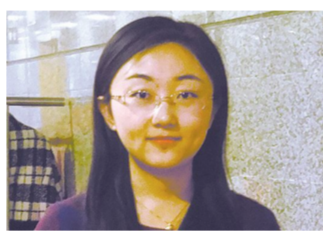
人大代表、南开大学校长龚养宏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,直戳高教领域痛点。他说,在职务后面加上“副部级”是一件丢人的事。龚校长的观点成为教育“去行政化”的又一个形象表述。

两会期间,“去行政化”依然是科教领域代表、委员在发言中频繁出现的词汇。

那么,去行政化到底是要去掉什么?或许自去年以来发生的几件事更能说明这个问题。

两会召开前不久,“透明计算”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事件使科技奖励制度成为讨论的焦点。中国计算机学会发文“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级科技奖励评审”,一时舆论哗然。

无独有偶,在全国政协会议科技界分组讨论会上,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苏国萃委员,曾向媒体回忆过一次调研见闻。几年前,一项国家重大工程的科技攻关项目申报科技奖项时,获奖单位排名中,竟然是地方政府排在第一、二位。而真正承担科研任务的研究所,却只能排名末位。



贵族气质——自黑 or 调侃?

■本报记者 倪思洁

一直以来,主流价值观多把科研精神归纳为创新精神、“两弹一星”精神,以突出科研人爱国、奉献、奋斗等精神特质,并逐渐内化为科研人对自身认同的一种定位。

不过,今年两会,政协委员、中科院院士姚檀栋给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回答——贵族气质——“做科研就得有贵族气质,不为吃穿用度操心,不用疲于奔命,能心无旁骛地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”。

然而,当姚院士的观点一经在科学网发布,机智的网友就一语道破了现实的残酷:“下个月房租还没着落呢。”

近些年,中国科技界越来越有钱了,可是,贫富差距也越来越明显。调查数据显示,20%的人控制着90%的经费。这些数字并不抽象。“有一些单位,做得最好的人,不见得是最有钱的人,而最有钱的人,经常不是产出很多的人。”政协委员、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直言不讳地说。

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。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、中科院院士高鸿钧指出,近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比例不足5%,仅仅是发达国家比例的1/4,这是导致我国原创能力和氛围不足的根本原因之一。

无恒产者无恒心。让这些每天操心着房租、水电费的科学家对基础科学研究抱有“贵族气质”,恐怕有些强人所难。

按照姚院士的本意,提倡贵族气质,不是让科学家走进象牙塔,而是让他们能够戒骄戒躁,投身于真正的科研创新中。然而,从目前看来,这种气质要求,似乎更主要的不在于科学家本身,而在于现有的科研创新环境和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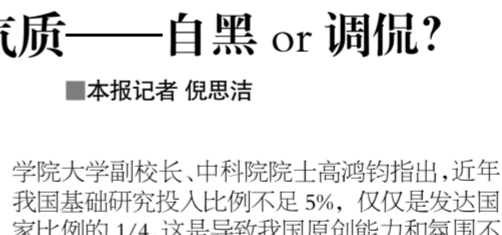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科技工作,政府要做到三个‘稳’,确定稳定的科研方向、保持稳定的科研队伍和给予稳定的经费支持。”政协委员、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呼吁。

“科研经费多了,但有钱不可任性,应增大项目支持强度,便于科研人员在一线安心工作。”政协委员、吉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徐涛说。

每个声音里,都有“广厦万千,寒士欢颜”的愿景与期盼。而科研贵族,这个尽管暂时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神存在,也远不只是院士一个人的向往。

在全国两会这样严肃的国家政治生活大事件中,也从不缺乏热闹与鲜活。而这些热闹鲜活往往是由颇具争议的提案议案引发。

“人民币改版可反腐”“产假延长至三年”“对于城市打工者而言高铁票太贵应降价”“过年休至正月十五”……这些“雷人”的提案议案,一经提出总是会充斥各类媒体,激起唾沫无数。



“雷人”提案议案——另有深意?

■本报记者 陆琦

在全国两会这样严肃的国家政治生活大事件中,也从不缺乏热闹与鲜活。而这些热闹鲜活往往是由颇具争议的提案议案引发。

“人民币改版可反腐”“产假延长至三年”“对于城市打工者而言高铁票太贵应降价”“过年休至正月十五”……这些“雷人”的提案议案,一经提出总是会充斥各类媒体,激起唾沫无数。

其实不难理解。两会期间,忙碌的不仅是积极履职的代表委员,还有数千媒体记者奔波在会场、驻地,这同时是一场媒体与信息的战役。媒体关注“雷人”提案议案,追求高关注度,也在情理之中。

但是,当我们看完这些“雷人”的提案议案,也不禁觉得新鲜。诚然,一些提案、建议经媒体报道后未必全面,有的还比较笼统、空泛,存在可行性、操作性上的缺陷。但如果仅仅把它们视为两会期间的花边新闻,而忽略了其建言献策的智慧努力,特别是针对公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的回应,则有买椟还珠的嫌疑。

由此,对于这些提案议案,更应该持鼓励态度。毕竟,只有发现问题,承认问题的存在,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。

要形成解决问题的新政策,不应只是简单地达成共识。针对同一问题,在共识之外,需要聆听多一些不同见解,在思想碰撞中达成政策设计、操作的最优化。

更为关键的是,尽管很多生猛的建议引来无数争议,但不可否认,提出这些建议的代表委员们所关注的问题,例如高铁降价的提议,往往是更“接地气、体民情、惠民生”的问题。比起那些或大而无边或以点盖面且缺乏新意的意见建议要好得多。

代表委员在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活动中,如何评价其履职表现,不在于看他们请示、汇报、表功的能力,而在于看他们挑刺、质疑、建言建议的能力。

表达上有冲突不可怕,可怕的是面对利益上的冲突无动于衷。只有在正常渠道和环境下去展开充分的利益博弈,才是形成公平合理的公共利益的必经阶段。由此,期待代表委员表达更多元、尖锐的观点。